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世纪 中国修辞学(上卷)

宗廷虎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世纪中国修辞学

上卷

宗廷虎 主编

宗廷虎 吴礼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宗廷虎，1933年生，江苏扬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及华东修辞学会顾问。独著、合著《修辞新论》、《汉语修辞学史纲》、《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宗廷虎修辞论集》等论著10余部。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并合撰第二、第四卷。主编《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并合撰中、下卷。《汉语修辞学史纲》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现代修辞学史》获上海市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修辞学通史》获“中国图书奖”，《中国修辞史》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工作者。

吴礼权，1964年生，安徽安庆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独著《中国修辞学史》、《修辞心理学》等专著12部，合著《中国修辞学通史》、《中国修辞史》等8部。获国家级奖项2项，省部级奖项5项。发表论文150余篇。曾受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作学术讲演。

序

宗廷虎先生以研究修辞学理论和撰写汉语修辞学史名家。现已有《汉语修辞学史纲》（与李金苓合著）、《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独著）、《汉语修辞学史》（与袁晖联合主编并撰写）、《中国修辞学通史》（与郑子瑜、陈光磊联合主编，并与李金苓撰写了其中的《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和《近现代卷》）、《宗廷虎修辞论集》（独著）、《修辞新论》（主持合作撰写）等专著问世。这本《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则是由宗先生主编，并与高万云、吴礼权先生分工合作撰写的又一本修辞学史专著。宗先生的多本修辞学史专著相继出版，不仅仅是宗先生个人的成绩，也显示着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丰收。

此书称：“80 年代以来涌现的古今修辞学通史专著有六部，另外专论现当代修辞的有五部。”^[1]此书是其后出版的第 12 部。应该说，此书对此前的修辞学史专著和论文，不论是宗先生自己编撰的还是别人编撰的，都是有所承传的，可谓厚积而厚发。不过，又并非一仍旧制，而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承传和创新、突破，所在多有，相对集中在此书的主要撰写特色方面。比如确定“以论带史、以史促论、史论结合”为全书撰写原则、对白话修辞学与文言修辞学发展的轨迹进行梳理、重视对临近学科学者修辞论的总结等。而这些主要特色，又都在理论的阐发和史料的处理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以“史”“论”关系而言，宗先生自谓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研究修辞学史时，就在“尝试着走一条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道路”^[2]。在总结 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版的《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经验时，又郑重申明：“总之，史论结合，在史实的阐述中加强理论探讨，是《通史》的重要追求。”^[3]宗先生把史论结合看作是自己研究修辞学史的一条道路和一种追求。此书则更进一步把这条道路和这种追求转化为全书撰写原则，而又以这个原则的切实贯彻，构成了此书的一个主要特色。此书继往开来地走着这条道路，越来越

越执著地实现这种追求。

何谓以史促论? 简要地说, 就是“从史料与史料的关系中总括出规律”^[4]。沿着这种说法的思路, 可以理解为以史料促成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产生, 史料是动因, 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是结果。无“因”自然不能促成“果”, 所以此书强调“搜集史料一要‘充分’, 二要‘系统’”^[5]。但有“因”而不去促, 也同样不能促成“果”。所以此书批评了那些“仅仅是排列史料, 很少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6], 因而不能促成正确的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产生的“重史轻论”现象。

当然, 以史促论的“史”, 还关乎对史料的真伪鉴别和价值高低的评定的问题。以伪作真, 误低为高, 都不能促成正确的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产生。这就需要“将修辞研究置于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7]。每一个史料都出现和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它和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社会形态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只有把史料放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检验, 才能正确把握、深入理解它, 并运用它来促成正确的修辞评论和修辞理论的产生。此书正是以此显示其特色的。比如此书一方面确认了文言与白话之争, 其结果是文败白胜, 文言修辞学与白话修辞学之争, 其结果是白话修辞学作为胜利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又确认文言修辞学仍然有所发展、与时俱进。这一修辞评论, 看似自相矛盾, 难以理解, 实则言之成理, 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持之以立论的史料是被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且通过了检验的。此书是把这场争论的种种史料放在当时革新与守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放在文言与白话在适应社会生活和时代需求的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放在文言文根深蒂固、仍有一定的用场等等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检验, 然后才作出这一修辞评论的。

文言修辞胜于白话修辞, 白话不能修辞之类的修辞评论在中国大陆早已随着产生这类史料的社会大背景消失而销声匿迹了。不过, 在台湾, 时至 1978 年竟然还有认为“语体文是尚自然的口语, 不主修饰, 不拘规格, 与修辞原则不相符合”^[8]的修辞评论出现。此书指出, 这种观点, “似乎仍与‘五四’前后修辞学界所谓‘白话不能修辞, 文言才能做美辞’的观点相同”^[9]。对此, 我们也不必惊诧, 只要把这种史料放在当时台湾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就能明了它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了。

白话修辞学蓬勃发展,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文言修辞学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因为它也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文言是中华民族上下

几千年文化典籍如经史子集等的重要载体，有中华文化在，就有中华文化典籍在；有中华文化典籍在，就有文言文在；有文言文在，就有文言修辞在；有文言修辞在，就有文言修辞学在。把文言修辞学放在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就能看到它的生存空间。我这也是在以史促论。

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测，随着修辞研究与计算机合作的进展，随着社会对这种合作的需求的日益增长，普遍地利用计算机对文言文作处理（如文言文机器翻译之类）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时候，参与这一工作的，不但是语言工作者要掌握文言文，就是科学工作者也要掌握文言文，文言文修辞学也就更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了。我想，到那时，宗先生如果再写一部汉语修辞学史，一定会写上这一笔的。我们拭目以待。

何谓以论带史？按照书中的简要诠释，就是“运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来“对史料进行深入地开掘和评论”^[10]。也就是说，运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引，把对史料的开掘和评论带上正确之路。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开掘和正确的评论，犹如没有正确的考古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对地下文物进行深入的开掘和正确的鉴定一样。

此书认为：“‘修辞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它的构成除了语言因素外，还包括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所以社会上的任何一个成员，只要他进入写、说，必然要接触修辞。多门学科的学者，不论是哲学家、政治家、美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文章学家和演讲学家，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修辞理论，这已为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证明。”^[11]又认为：“修辞学具有多边性、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12]此书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意识，才以之作理论指导，从而开掘出 20 世纪不少临近学科许多学者的大量修辞评论，同时给予详尽深入的评论的。此前的修辞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虽然也有涉及，但所论及的学者及其修辞评论数量不多，一般来说，评论也不够详尽深入。这大抵与这种理论意识不强，因而未能明确地以之作理论指导来开掘和评论有关。此书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展示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一是史料大增：“整个 20 世纪，多门学科专家均提出过重要的修辞学理论，如政治家、哲学家蔡元培、胡适、毛泽东，文学家鲁迅、朱自清、叶圣陶、老舍、钱钟书，美学家朱光潜，史学家陈垣，语言学家马建忠、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均从不同角度提出过重要的修辞理论，

而尤以钱钟书最为突出。”^[13]此外，启功、冯友兰、费孝通、王蒙、汪曾祺、鲁枢元、王一川等临近学科专家及其修辞评论也都成为开掘和评论的重要对象。^[14]二是评论更为详尽深入。比如对钱钟书所作的修辞评论长达三万余言，更是前所未有的。此书把钱钟书散见于诗文赏析、典籍考证之中的大量精辟的修辞评论梳理成为一个包括他的语言观和修辞观、文艺修辞理论、理解修辞理论、翻译修辞理论、修辞方式、语言风格、修辞史等的系统^[15]，另外，又从方法论的角度专门对他的修辞研究法作出评论。^[16]再如把著名作家王蒙来自自身写作经验的修辞评论大多评论得既不失其原有的文意和文采，又符合修辞学的科学规律和语言表述。

此书所作的修辞评论，因以修辞是复合体，修辞学具有多边性、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的理论为指导，所以特别重视不同门类学科的学者的修辞评论的不同长处。举凡哲学家以其思辨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语言学家以其语言理论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文学家以其写作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美学家以其审美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以及其他门类学科的学者各以其专业功力见长的修辞评论，无不力图广取旁收，为我所论，为我所用。

还以对王蒙的评论为例。评论时，首先转述王蒙的修辞评论，说王蒙承认中国语言的最大缺点就是不精确，如名词不加以说明的时候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但他又同时强调中国的文学的优势也恰恰在语言上。王蒙以他的小说《夜的眼》为例作了说明。他说有苏联人和美国人问他这“眼”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因为对此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眼”指的是电灯泡，那就是单数。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主人公陈杲观察各种事物的眼睛，那必须是复数，因为是人的眼，要加“s”。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抽象的，没有数的概念，就是夜晚本身的眼睛，把夜晚拟人化，夜晚是没有单数复数之分的，也是单数。他说，在汉语里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当时起的名字就恰恰有这样的一种神秘感，你可以说夜本身的眼，可以说夜里行人的眼睛，也可以说是电灯泡好像夜晚阴森孤独的眼睛，都可以。但翻译到其他民族语言的时候却要解决的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的问题^[17]。本书作者转述之后，评论说：“（由此）可以看出王蒙的那种自豪感，也可以看出王蒙对语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对文学语言、文学修辞的认识才更具科学性。”^[18]此外，与此有关的评论在上文中也有几处：“王蒙更重视汉语的特质和表达功能，无论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理论阐述中，他都反复提

到汉语的个性特征和无可替代的表达功能，好多时候比语言学家的研究毫不逊色。这些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汉语文学作品的研究中。”^[19]“王蒙认识语言与语言学家不同，他是以一个作家，一个语言使用者的身份介入的。”^[20]由此可见，王蒙凭借深厚的写作功力作出了具有自身专业特色的修辞评论，而此书把它作为史料给以正确的评论，从中吸取修辞学的理论营养。王蒙的这一番修辞评论，是对非形态语言的汉语在文学修辞上的独特作用的充分肯定和欣赏，语言学家当然可以更为准确地说明汉语的这一特点，但不能像王蒙那样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具体生动地说明汉语在文学修辞上的独特作用。可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此书则是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如果单从要说明汉语语法的非形态特点看，则王蒙的这一番话，未必能抵得上语法学家黎锦熙说的汉语语法“偏重心理，略于形式”^[21]八个字。自然，黎锦熙作的是语法说明，王蒙作的是修辞评论，二者在修辞评论上互不搭界，可比性不大。

至于一人而兼多门学科的专家或一人属某一门学科专家而同时在其他门类学科也有相当水平者，他们是如何以其多种专业功力之长作修辞评论的？其修辞评论的长处和价值又是怎么样的？当然也是修辞学史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书把“重视对临近学科学者修辞论的总结”作为撰写的主要特色之一，是有理论依据、富于成效、值得称道的。还应该指出，这也符合当代常常使用多科综合研究方法的学术潮流。因为从认识论上说，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历史发展进程，一般来说，是由综合发展到分析，再发展到更高一个层次的综合的进程。与此相应，从科学研究方法上说，就是由多科混一的方法发展到分科独立的方法，再发展到更高一个层次的多科综合的方法（所谓边缘学科研究法）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在当代，在重视使用分科独立的方法的同时，也重视多科综合的方法的使用。

总之，这也就是以论带史。可见以论带史能够带出充分系统的史料和正确深入的评论来。既拓宽了修辞学史的研究范围，也突出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精神。

以史促论，以论带史，是史论结合的具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史促论是以“史”为手段，以“论”为目的；以论带史，是以“论”为手段，以“史”为目的。而史论始终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论”和“史”都必须互相结合构成一个统一体，但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又是可

以互相转换角色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对以论带史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以史促论的事实。以此书的论述而言，我们从对临近学科学者的大量修辞评论的开掘和评论的过程中，就可以验证或者说反证出修辞是复合体，修辞学具有多边性、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的修辞理论是正确的。自然，首先看到的是以论带史的事实，对此，前文已作过详尽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客观事物，总是彼此系连、相互沟通的，临近的事物，更是如此。我以为“以论带史、以史促论、史论结合”的观点，是可以在哲学思辨中找到根据的。这种观点，不仅是此书的主要特色之一，从方法论上说，也是此书在修辞学自身层面上最高层次的统摄性的研究方法。

创新、突破往往意味着质的飞跃。在这种“飞跃”进程中，会遇到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由于临近学科学者的修辞思想的表述的非系统性和非修辞专业性，增加了对史料的适当鉴别和选取的难度；由于其修辞思想时有逸出现有修辞学框架的新意，又增加了对其修辞思想的价值的高低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难度。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书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即如对钱钟书在修辞学上的定位问题，就颇费斟酌。我以为，定位时，既要以钱钟书自身条件为根据，也要以陈望道及陈望道之后的其他重要的修辞学家为参照；把问题放在修辞学发展过程中加以思考，才能得出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陈望道为汉语修辞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提出了能够统摄汉语修辞学整体的有关修辞理论和准则，并贯彻到自己的修辞学论著里的种种论述之中，取得了汉语修辞学的奠基者、创始人的历史地位，他的修辞学说对其后的修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陈望道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修辞学的一个高峰，可谓前无古人。但是，这又绝不意味着后无来者。事实上，其后也已经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因为修辞学总是与时俱进的。发展既然未有穷期，高峰自然可以叠出。为此，此书认定“钱钟书是我国 20 世纪继陈望道之后的又一座修辞学高峰”^[22]是有学理依据的。至于钱钟书本人，他作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出了大量精辟的修辞评论，对修辞学有很大的贡献，无愧为一个修辞学大家，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把他看作是陈望道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也是言之成理，至少可备一说的。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钱钟书是作为一个修辞学的临近学科的学者成为修辞学的又一个高峰的，其修辞学说，在观点的非修辞专业性和表述的非系统性方面，是十分难得的特色与十分难免的局限并存的。但是前者占据了主要地位，至少在这些方面，钱钟书同别的作为陈

望道之后的又一个高峰的修辞学家是有所不同或者说是各有特点的。我的以上分析，或许有助于把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更周全一些。

“修辞立其诚”，治修辞学史当然也要立其诚。书中对我国的零珠碎玉、吉光片羽的修辞评论，既肯定其确有珠珍玉贵的一面，又不讳言其不利于修辞学系统构建的不足^[23]。既肯定陈望道提出的修辞要关注接受问题的意见，又指出他在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时仍然侧重表达修辞的不足^[24]。对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既肯定它“确实对推动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学知识的普及起到了任何其他同类学术著作所无法比肩的作用”^[25]，又指出它“不是纯粹的修辞学专著，在修辞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建构等重要方面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之处”^[26]。对台湾地区的修辞学，既肯定它分析具体辞例时继承了中国修辞学研究的传统、从文学角度旁征博引的长处，又指出它存在着研究范围局限于辞格和文言文修辞，又缺少新理论、新方法的不足。^[27]对临近学科学者的修辞评论，不因为它“门外文谈”而拒之门外，反而认为它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而重视之。这些都是治史立诚的表现，在史德方面是应予以肯定的。

临末，该是说“是为序”的时候了。不过，我想，不说也无妨，反正就写到这里了。

张炼强

2004年7月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

注释

[1] [4] [5] [6] [7] [10] [11] 本书第一编第三章。

[2] [3] 《宗廷虎修辞论集》，522、304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

[8] [9] 本书第四编第二章。

[12] [13] [16] [22] 本书第一编第二章。

[14] 详见本书第五编第十一章。

[15] 详见本书第五编第一章。

[17] [18] [19] [20] 本书第五编第十一章。

[21] 黎锦熙：《新著国语法》引论，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

[23] 本书第一编第一章。

[24] 本书第五编第一章。

[25] [26] 本书第三编第二章。

[27] 本书第四编第一章。

目 录

第一编 纵 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修辞研究的主要特点	(3)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主要成就和重要特征	(9)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9)
第二节 修辞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了 有代表性的修辞学理论	(13)
第三节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 修辞学在白话文体与文言文体的竞争中发展	(22)
第四节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二): 构建体系的演进	(41)
第五节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三): 百年来与时俱进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方法	(46)
第三章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历史经验及本书撰写特色	(65)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历史经验	(65)
第二节 本书主要特色	(70)

第二编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草创及初步发展时期 (1901—1948 年)

第一章 引 论	(77)
第一节 时代呼唤着现代修辞学的诞生	(77)

第二节	白话修辞学与文言修辞学在竞争中共同发展	(79)
第三节	修辞学研究中的新、旧派之争	(81)
第四节	相邻学科学者对修辞学研究的贡献	(83)
第二章	草创期的修辞理论	(86)
第一节	蔡元培的修辞论	(86)
第二节	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两本开创性著作	(94)
第三节	现代修辞学草创期又一本代表性著作 ——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修辞编》	(102)
第三章	白话修辞论的萌芽及发展	(109)
第一节	梁启超论“新文体”修辞	(109)
第二节	胡适的白话修辞论	(112)
第三节	吕云彪等《白话文做法》的白话修辞论	(124)
第四节	傅斯年、陆殿扬、云六、何爵三的论文	(127)
第五节	唐钺的修辞学论文及两本论著	(134)
第六节	董鲁安、张弓、章衣萍、陈介白的白话 修辞学专著	(142)
第七节	陈望道的系列论文和《修辞学发凡》	(155)
第八节	白话文运动的结晶 ——汪震《国语修辞学》和宋文翰 《国语文修辞法》	(169)
第九节	祝秀侠、郭绍虞的修辞学系列论文	(174)
第四章	文言修辞论的发展	(186)
第一节	胡怀琛《修辞学要略》和郑奠《中国 修辞学研究法》	(186)
第二节	王易的两本修辞学著作	(190)
第三节	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	(195)
第四节	金兆梓等著于三四十年代的一批修辞学著作	(201)
第五节	宫廷璋的《修辞学举例·风格篇》及其 修辞学论文	(207)
第六节	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和胡光炜的修	

辞学史论文	(216)
第五章 相邻学科学者的修辞研究	(225)
第一节 鲁迅的修辞论	(225)
第二节 叶圣陶的作文修辞论	(233)
第三节 朱自清的文学修辞论	(243)
第四节 朱光潜的文学、美学修辞论	(251)
第五节 陈垣的史讳研究	(264)
第六节 黎锦熙语法著作中的修辞学认识	(271)
第七节 王力的修辞学研究	(277)

第三编 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创立与发展时期 (1949—1965 年)

第一章 引 论	(297)
第一节 发展大势及特点	(297)
第二节 主要成就及其原因	(298)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300)
第二章 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普及	(301)
第一节 现代汉语修辞学得以普及的原因	(301)
第二节 现代汉语修辞学普及性著作的代表作	(305)
第三章 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深入	(311)
第一节 基本概况	(311)
第二节 修辞学理论问题的探讨	(313)
第三节 修辞手法研究的深入	(317)
第四节 语体风格的研究及其进展	(320)
第五节 修辞学其他方面的研究	(326)
第四章 现代汉语修辞学创立与深入的标志性著作	(337)
第一节 张瓌一的《修辞概要》	(337)

第二节 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	(340)
------------------------	-------

第四编 台湾及港澳地区的修辞学研究 (1950—2000 年)

第一章 引 论	(349)
---------------	-------

第一节 台湾地区修辞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349)
第二节 台湾地区修辞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351)
第三节 港澳的修辞学研究概况	(352)

第二章 台湾地区前期修辞学研究的成就及其代表作	(353)
-------------------------------	-------

第一节 黄永武的《字句锻炼法》	(353)
第二节 傅隶朴的《修辞学》	(356)
第三节 徐芹庭的《修辞学发微》	(360)
第四节 黄庆萱的《修辞学》	(363)
第五节 张严的《修辞论说与方法》	(366)
第六节 林月仙的《实用修辞学》	(370)

第三章 台湾地区后期修辞学研究的成就及其代表作	(372)
-------------------------------	-------

第一节 沈谦的修辞学研究	(372)
第二节 蔡宗阳的修辞学研究	(382)
第三节 董季棠等的修辞学研究	(388)

第四章 港澳的修辞学研究	(411)
--------------------	-------

第一节 郑子瑜的修辞学研究	(411)
第二节 港澳其他学者的修辞学研究	(420)

第一编 纵 论

20 世纪以前，中国修辞学研究虽然发展了 3 000 多年，但一直在古代修辞学范畴里缓步前行。踏入 20 世纪后，中国修辞学的面貌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百年里，现代修辞学的历程是：从萌芽到建立到向纵深发展再到繁荣。尤其是 20 世纪后 20 年，现代修辞学的空前繁荣，为 21 世纪中国修辞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厘清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新世纪修辞学能否顺利发展，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中国古代修辞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源远流长，资源丰富，呈现零珠碎玉、吉光片羽的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研究修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源远流”。

已有好几位学者，如郑子瑜、张寿康、胡性初等论及，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修辞的论述。例如郑子瑜举出郭沫若的《卜辞通纂》第426页的一个记载：“王固（占）曰，乃若偶。”指出这句话的译文应是：“王占了以后，说，那卜辞有称扬的意味！”并分析此话“说辞美好秀丽，是从辞本身论修辞，这里说辞义称扬是从辞的内容论修辞。两者都是对辞的看法或意见或感想，所以说，这一句卜辞是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的最原始的资料，应该是可以说得过的。……在三千多年前，或者说接近四千年前，修辞思想刚刚萌芽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相当完整的谈修辞的句子，已是十分难得，弥足珍贵了。”^[1]在此之前，张寿康在《甲骨刻辞和吉金铭文的修辞举例》一文中也引了《卜辞通纂》中的这句话，并分析：“‘偶’，《说文》：‘扬也’。这里是名词。这句话也有本体、喻体的内容，‘乃’是‘本体’，‘偶’是喻体，‘若’是比喻词。”^[2]对同一句话，两人有不同的分析角度。郑氏认为这句话是修辞理论，是修辞思想的萌芽；张氏则从修辞现象的角度，认为这句话是比喻，并分析了哪个词是本体，哪个词是喻体和比喻词。并指出甲骨卜辞中的另四句话分别为排比、设问等修辞现象。除了甲骨文中修辞思想的萌芽外，金文中也有修辞思想的萌芽，这一点郑子瑜和胡性初分别在各自的论文中有所论述。胡性初发表了《论中国修辞思想萌芽期的论定》、《甲金文修辞思想例释》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体现修辞思想的甲金文多例，证明“中国修辞思想萌芽于商周甲金文时代”^[3]。不论从哪个角度论述，均证明了我我国修辞资源的历史十分悠久。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均有精辟的修辞理论问世。^[4]以孔子来说，他生于公元